

中国劳动力迁移决定因素研究综述*

姚先国 冯履冰 周明海

【摘 要】文章通过梳理中国 21 世纪以来劳动力迁移新特征和政策演变,综述影响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因素。结果显示,尽管决定微观个体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因素较多且各不相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迁出地土地要素的制约作用,迁入地收入因素的吸引作用,以及迁入迁出地间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近 10 年,城乡融合和区域平衡的包容性发展弱化了迁出迁入地的“推拉”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则要求迁移和流动方式从低技能劳动力的单向迁移向高素质人才的双向流动转变。因此,劳动力迁移政策已从是否允许劳动力迁移转向如何促进劳动力、人才畅通有序流动,这对未来劳动力迁移和流动提出了新挑战。据此,文章从现实背景和重点问题两方面切入,提出未来中国劳动力迁移和流动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劳动力迁移 人才流动 政策演变 人力资本投资 决定因素

【作 者】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冯履冰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周明海 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侧重商品市场化改革,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就劳动力市场而言,中国虽从以行政主导的劳动分配制向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转型,但仍面临劳资矛盾尖锐、大学生就业难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3 个重要问题(Freeman, 2014)。这些问题将成为阻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向高水平和高标准迈进的掣肘之一。

目前中国劳动力迁移政策已经从是否允许劳动力迁移转变为如何促进劳动力合理、公正、畅通、有序流动。中国劳动力迁移将更多表现为区域间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鉴于此,本文将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分析 21 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迁移的新特征和相关政策的变化;在综述有关劳动力迁移决策的研究的基础上,从迁出地、迁入地及两地间的互动关系三方面考察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兴技术与消费需求分化冲击下的中国劳动力流动规律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编号:72034006)的阶段性成果。

一、中国劳动力迁移的新特征与政策演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工潮,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总量约为1.5亿,且以省内迁移为主,占总迁移人口的73.4%(Cai等,2003;Freeman,2006)。在此期间,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应对国企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就业压力,出台了一些限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政策,以保护本地劳动者的就业稳定。

21世纪以来,劳动力迁移已从计划性的永久迁移向市场性的临时迁移转变(马忠东,2019)。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幅降低了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行业蓬勃发展,产生了大量劳动力需求,引发了新一轮中西部地区农民到东部沿海城市务工就业的跨省流动潮(Facchini等,2019)。为了从供给侧回应劳动力需求的新变化,劳动力迁移政策开始致力于打破城乡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积极鼓励劳动力跨地区迁移,力图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劳动力迁移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为跨省迁移趋势有所回落、迁移目的地更趋分散、回迁数量有所增加、新生代迁移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举家迁移和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迁移行为日趋明显等(Liang等,2014;Zhao等,2018;马忠东,2019;Wang等,2019)。为了应对这些新特征,中国从2011年起实质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按城市(镇)类型和人口规模分类,逐步取消、放开、放宽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镇)的落户限制。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促进劳动力迁移涉及户籍、就业、财政、教育、住房、城镇建设等多方面内容,仅靠户籍制度单方面改革难以奏效。因此,为了鼓励农民工落户城市(镇),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国家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配套实施了土地、财政和住房政策措施。这些配套政策统筹协调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机制上保证了改革的全面落实和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迁移的规模和形式受到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迁移政策的影响,而这些政策变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引致新需求的积极反应。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力迁移政策侧重于控制流动,虽然产生了城乡分割等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迁移政策经历了从控制流动到允许流动、再到鼓励流动的渐进式演进过程,但未从根本上撼动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

近10年,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战略举措的全面推进,城乡间制度、产业和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出现了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为主要特征的城乡融合式发展(金成武,2019)。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金融推动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促进了中国区域间和群体间的包容性

增长(张勋等,2019)。尽管城乡融合和区域平衡发展让改革成果可以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但有可能弱化农村和落后地区居民的迁移意愿,从而对下一阶段的城乡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提出更大的挑战。因此,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未来迁移政策的重心不再是让不让劳动力迁移流动,而是转向如何促进劳动力合理、公正、畅通、有序流动。

随着中国经济从低劳动力成本的粗放式增长向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高质量发展不断迈进,过去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区域、从传统到现代部门的单向劳动力迁移流动模式将转变为城乡间、区域间、行业 and 部门间的双向人才资源迁移流动方式(汤铎铎等,2020)。近年来,中国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地方政府间展开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这不仅反映出区域对人才资源的迫切需要,也反映出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的新要求。因此,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实现高素质人才的畅通有序流动与有效配置,以“人力资本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的动态特征(Bodvarsson 等,2015)。下面分别从迁出地、迁入地和两地间联系 3 个视角分析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一) 迁出地视角下的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迁移行为是迁出地负向激励“推挤”迁移者的结果。Giles 等(2007)研究发现,旱涝灾害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外迁移的重要因素。刘学军、赵耀辉(2009)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越大,本地就业机会越少,迁移概率越高。王子成、赵忠(2013)发现,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农户因缺乏获得稳定收入的土地资源而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吴方卫、康姣姣(2020)发现,即使回流的农村劳动力也可能因农业经营收入不稳定而再次外出。从积极的角度看,上述迁移行为也可视为应对迁出地负向因素的途径,起到风险对冲的作用。同时,迁出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积极变化也会正向推动农村劳动力的外迁决策。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释放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后续大规模劳动力迁移创造了条件。吕炜等(2015)研究发现,国家对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机械替代劳动力,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王小增、王林萍(2020)研究发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父母的覆盖降低了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从而显著提高成年子女向县外和省外迁移的概率。

“留恋”因素是人们对迁出地正向激励因素的主观反应。骆永民等(2020)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诊所等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农民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意愿。“留恋”因素也可能是对制约劳动力迁移负向激励因素的消极反应。Mullan 等

(2011)研究发现,土地特别是林地产权的不稳定是农村劳动力外出迁移务工的主要障碍。Giles等(2018)发现村干部选举将影响农村集体土地的重新分配并增加土地产权的不稳定预期,进而降低村民外出迁移务工的概率。陈媛媛、傅伟(2017)认为,承包地流转成本增加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由于“推挤”和“留恋”因素主要与迁出地相关,可视为劳动力迁移的供给侧因素。

一些研究从家庭特征的角度考察阻碍农村劳动力外出迁移的因素。Giles等(2007)研究发现,老年父母健康状况不佳会阻碍农村成年子女向外迁移。贾男、马俊龙(2015)研究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不可携带性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对中老年人的锁定效应高于青年人。Cai(2020)则认为,贫困户的信贷约束是制约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因素。

(二) 迁入地视角下的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拉引”和“远离”因素主要与迁入地相关,可以视为劳动力迁移的需求侧因素。由于迁入地有更多增收机会,从而产生正向激励“拉引”迁移者流入。“拉引”因素包括迁入地工资水平较高、就业机会较多、税收负担较低、产权保护较好、教育资源较优、个人自由及社会流动充分。相反,“远离”因素指让人们远离迁入地的负向激励因素,主要针对迁移者而非本地居民,包括较严的迁移法律、较高的语言壁垒、较多的歧视政策、较低的社会地位、较少的政治权力、较大的文化差异和较多的不确定性。

已有研究证实了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收入差距是“拉引”劳动力迁移的核心因素,这与二元经济理论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视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动力一致。例如,Zhu(2002)证实了地区收入差距对中国劳动力内部迁移决策的重要性。邢春冰等(2013)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对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迁移概率产生了显著影响,表明个体劳动力迁移决策与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是联动的。

近期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收入差距以外的“拉引”因素。夏怡然、陆铭(2015)认为,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希望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还希望享受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刘涛等(2019)发现,社会心理的融合比经济层面的融合更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在迁入地的居住意愿。王伟同等(2019)发现,劳动力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存在地区代际流动偏好,出身地位较低但具备较强社会地位跃升能力的高技能人群会依据偏好选择高代际流动地区进行迁移。Facchini等(2019)发现,贸易自由化引致的劳动力需求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民迁移到东部沿海城市务工的重要原因。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迁移,使城市劳动力市场呈现城乡户籍、本地与外地户籍双重分割的特征,这是许多潜在迁移者“远离”迁入地的重要原因(Meng等,2001)。90年代起,中国户籍管理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改革促进了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Chan等,1999;Meng,2012)。关于户籍改革对劳动力迁移作用

大小,研究观点不一。例如,陈钊、陆铭(2008)认为,户籍改革是实现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转变的必要条件;孙文凯等(2011)认为,21 世纪初期的户籍改革并未显著促进短期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周文等(2017)认为,只有土地和户籍的联合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劳动力永久迁移的城市化。此外,迁入地政府对外来劳动力设置了不同的落户门槛,影响其公共服务可得性,成为导致农村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王子成、赵忠,2013;张吉鹏等,2020)。

除户籍制度外,中国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房价高企和教育限制等也是造成潜在迁移者选择“远离”迁入地的原因。吴贾、张俊森(2020)发现,子女入学问题使农村迁移劳动力返乡概率提高 11.2 个百分点,这使城市损失可供利用的劳动力约为 1 270 万。孙伟增等(2019)发现,城市空气污染负向影响劳动力对迁移地的选择,高教育、已婚、非农户口的男性劳动力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对空气污染的弹性更高。一些研究还关注房价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显著降低了劳动力迁移和定居的意愿。一方面,住房成本上升显著抑制了低学历年轻女性劳动力迁入城市(张海峰等,2019);另一方面,高房价会挤出那些已经迁入城市但尚未购房的高技能劳动力(周颖刚等,2019)。

(三) 迁入、迁出地联系对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21 世纪初期,中国六成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借助迁入地的家人、亲戚、朋友、老乡等私人关系在迁入地城市搜寻并获得工作机会(Long 等,2017;Kinnan 等,2018)。迁移网络作为中国农民工搜寻工作的主要渠道,不仅降低了农民工的迁移和工作搜寻成本,其强弱还会对迁移和搜寻行为产生异质影响(Giulietti 等,2018)。郭云南、姚洋(2013)认为,祠堂和家谱作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可以有效增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概率和就业机会;但章元、陆铭(2009)认为,迁移网络的主要作用是配给工作,并不能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因而对提高农民工收入作用有限。近期的多项实证研究显示,通过迁移网络渠道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工资更低(Fang 等,2016;Long 等,2017;Chen 等,2018)。

迁入、迁出地的地理和文化距离会影响劳动力迁移。鲁永刚、张凯(2019)发现,地理距离和方言差异会阻碍中国劳动力的迁移,在空间距离上表现为对地理邻近城市的偏好,在文化距离上表现为对方言相似城市的偏好。

(四) 现有研究简评

从迁出地角度看,自然灾害和人口规模等因素导致的人均耕地和就业机会减少,归根结底是劳动力在迁出地面临的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困境。要打破这种困境,一是提高迁出地的生产效率,如过去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近年的乡村振兴战略都起到提升农业和农村生产效率的作用。然而,农业和乡村工业现代化仍不足以吸纳因劳动生产率提升释放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因此,迁出地政府需积极协助农村劳动力自主有序外迁,将外出务工的稳定收入和汇款作为农户的保险机制,这有助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个体因素,而制约农村劳动力外迁的最大

制度因素则是土地产权不稳定和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不兼容,这也是实现畅通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目标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因此,深化土地产权改革和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是迁出地政府协助农村劳动力自主外迁的重要抓手。

从迁入地角度看,劳动力迁移决策是就业、收入和房价等经济因素与子女教育、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入等非经济因素综合权衡的结果。因此,迁入地政府要想更有效地吸引人才和劳动力,就需要提升竞争力、探索改革现有户籍制度,综合利用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让人口落户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例如,2020年宁波、苏州和广州率先探索的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制度,消除了普通劳动者在一定范围内迁移后再次迁移的后顾之忧。三地成功探索的经验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充分肯定,户籍同城化累计互认已成为2021年刚颁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的重要部分。

从迁入地和迁出地联系角度看,目前中国的迁移劳动力主要借助文化语言和社会网络等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进行工作搜寻与匹配。尽管这些非正式制度为迁移者起到降低信息不对称和迁移成本的作用,但并不能有效提高其工资和收入水平,反而可能使其落入低收入均衡陷阱。因此,一方面迁移政策应当鼓励劳务中介企业根据劳动力供需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中的流动;另一方面迁入迁出地政府部门还可以通力合作,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搭建招工互动平台,为劳动者和迁移者提供正式、可靠和高效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整体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决定劳动力迁移的传统因素,如迁出地土地要素的制约作用、迁入地收入因素的吸引作用和迁入迁出地间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近10年,城乡融合和区域平衡的包容性发展将减弱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则要求迁移和流动方式从低技能劳动力的单向迁移向高素质人才的双向流动转变。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未来将不再是坐等甚至限制落后地区和农村迁移者的到来,而是应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引导劳动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让人才、劳动力按要素回报在城乡和地区间畅通有序流动(陆铭等,2019)。

三、研究展望

劳动力流动和迁移问题是国内外劳动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的不断丰富,中国劳动力迁移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在讨论主题、分析范式、实证方法等方面与国际密切接轨。尽管决定微观个体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因素较多且各不相同,但总是可以从迁出地、迁入地及两地间的互动关系三方面进行分类考察。这意味着,有些阻碍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因素需要改革迁出地的政策,如农村土地确权政策和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政策;有些则需要推动迁入地政策的改革,如都市圈和城市群之间劳动力和人才落户积分互认政策;另一些还需要迁入迁出地的协调配合,如迁入迁出省份

土地和户籍改革的联动政策。立足现有研究,结合中国制度背景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境,本文认为以下研究方向和内容值得关注。

第一,在新兴技术和社会需求分化双重冲击的背景下,探寻和分析中国劳动力迁移和流动规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方面,新兴技术的突飞猛进对经济社会的各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其发展可能使部分工作岗位甚至部分传统行业消失,增加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然而,新兴技术也可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甚至新的行业,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新兴技术对不同年龄、性别和技能类型的劳动力可能产生不同的需求冲击。因此,新兴技术对各类劳动力在城乡、区域间和职业部门及行业间的流动会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外部经济需求不确定性增加和内部人口结构变化、居民收入水平和结构变动及新产品、新服务的涌现必将引起社会需求的分化。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围绕数字化生存需求的新业态、新模式被大量激发,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以激活国内经济循环的需求动力,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这些都将对劳动力迁移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反之,劳动力畅通有序迁移和流动也将促进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平衡发展,从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助力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第二,根据中国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新特征,研究劳动力畅通、有序流动和人才竞争融通过程中的重点问题。一方面,城乡融合和区域平衡的包容性发展虽然有效缩小了城乡和区域差距,但也减弱了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迁移意愿。不仅如此,低技能和大龄农民工还面临不能适应新兴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结构快速转型的问题,因而较难转移和匹配至新的岗位、职业和行业部门。因此,在破除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制度障碍的同时,重点是扫除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能力障碍”。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促进城乡间的教育公平,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的空间布局,实现城乡劳动力素质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对冲城乡区域间“推拉”劳动力迁移作用的减少。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迁移和流动方式从低技能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向高素质人才的双向流动转变。目前,中国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地方政府主要利用奖励和补贴的方式竞争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流入,但存在“用引分离”和“忽视培育”的问题。因此,除利用经济手段激励人才跨区域迁移流动外,提供优质培育平台激发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也应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1. 陈媛媛、傅伟(2017):《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劳动力流动与农业生产》,《管理世界》,第11期。
2. 陈钊、陆铭(2008):《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第1期。
3. 郭云南、姚洋(2013):《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世界》,第3期。

4. 贾男、马俊龙(2015):《非携带式医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锁定效应研究》,《管理世界》,第9期。
5. 金成武(2019):《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理论融合——兼谈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借鉴》,《经济研究》,第8期。
6. 刘涛等(2019):《流动人口的居留和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7. 刘学军、赵耀辉(2009):《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经济学(季刊)》,第2期。
8. 鲁永刚、张凯(2019):《地理距离、方言文化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统计研究》,第3期。
9. 陆铭等(2019):《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70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管理世界》,第10期。
10. 骆永民等(2020):《农村基础设施、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与非农就业》,《管理世界》,第12期。
11. 吕炜等(2015):《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12. 马忠东(2019):《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口迁移变动趋势——基于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13. 孙伟增等(2019):《空气污染与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基于流动人口就业选址行为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14. 孙文凯等(2011):《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期。
15. 汤铎铎等(2020):《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第8期。
16. 王伟同等(2019):《人口迁移的地区代际流动偏好: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管理世界》,第7期。
17. 王小增、王林萍(2020):《“新农保”拉近了父母与子女的空间距离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6期。
18. 王子成、赵忠(2013):《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外出、回流还是再迁移》,《管理世界》,第1期。
19. 吴贾、张俊森(2020):《随迁子女入学限制、儿童留守与城市劳动力供给》,《经济研究》,第11期。
20. 吴方卫、康姣姣(2020):《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与再外出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21. 夏怡然、陆铭(2015):《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22. 邢春冰等(2013):《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1期。
23. 张海峰等(2019):《我国住房成本的空间演化与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经济地理》,第7期。
24. 张吉鹏等(2020):《城市落户门槛与劳动力回流》,《经济研究》,第7期。
25. 张勋等(2019):《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第8期。
26. 章元、陆铭(2009):《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管理世界》,第3期。
27. 周文等(2017):《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理论与模拟》,《经济研究》,第6期。
28. 周颖刚等(2019):《高房价挤出了谁?——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经济研究》,第9期。
29. Bodvarsson Ö.B., Simpson N.B., Sparber C. (2015), Migration Theory. In: Chiswick B.R., Miller P.W. ed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51.
30. Cai F., Wang D. (2003),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China Review*. 3(2): 73-93.
31. Cai S. (2020), Migration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Credit Acces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2: 102247.
32. Chan K.W., Zhang L. (1999),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 160: 818-855.

33. Chen Y., Wang L., Zhang M. (2018), Informal Search, Bad Search?: the Effects of Job Search Method on Wages among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1:837-876.
34. Facchini G., Liu M.Y., Mayda A.M., Zhou M. (2019), China's 'Great Migration': The Impact of the Reduction i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0:126-144.
35. Fang T., Gunderson M., Lin C. (2016), The Use and Impact of Job Search Procedures by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37:154-165.
36. Freeman R.B. (2006), People Flows in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145-170.
37. Freeman R.B. (2014), A Labor Marke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how G.C., Perkins D.H.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Economy*.
38. Giles J., Mu R. (2007), Elderly Parent Health and th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Adul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Demography*. 44(2):265-288.
39. Giles J., Mu R. (2018), Village Political Economy, Land Tenure Insecurity, and the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Decision: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00(2):521-544.
40. Giuliotti C., Wahba J., Zenou Y. (2018), Strong Versus Weak Ties in Migr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04:111-137.
41. Kinnan C., Wang S-Y., Wang Y. (2018), Access to Migration for Rural Household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0(4):79-119.
42. Liang Z., Li Z., Ma Z. (2014), Changing Patter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2000-201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0(4):695-716.
43. Long W., Appleton S., Song L. (2017), The Impact of Job Contact Networks on Wage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A Switching Regression Approach.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5(1):81-101.
44. Meng X., Zhang J. (2001),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3):485-504.
45. Meng X. (2012),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Reforms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75-102.
46. Mullan K., Grosjean P., Kontoleon A. (2011), Land Tenure Arrangement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9(1):123-133.
47. Wang C., Zhang C., Ni J., Zhang H., Zhang J. (2019), Family Migration in China: Do Migrant Children Affect Parental Settlement Inten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7(2):416-428.
48. Zhao L., Liu S., Zhang W. (2018), New Trends in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Profiles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s. *China & World Economy*. 26(1):18-41.
49. Zhu N. (2002), The Impact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3):213-230.

(责任编辑:朱 犁)